

中国 古代 小说 理论 研究

八六年春

湖北省
研究会编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

湖北省《水浒》研究会 编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汇集了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方面的研究论文，共计二十六篇。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收集在本书中的论文，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规律、中国小说美学、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民族特色等问题，作了横向和纵向的深入探讨；对古代的一些著名的小说批评家，如李贽、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作了分析和评价。这些论文一般都能做到观点新颖，材料翔实，论证有力，反映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可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参考，供专业和业余作家借鉴，也可供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

湖北省《水浒》研究会编

责任编辑 傅肇基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武昌象山》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沔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字数：284,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册

统一书号：10255·006 定价：2.70 元

序

李 尔 重

中国古代小说及其艺术理论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在上古神话中就表现出光辉的特色。《三五历论》中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是颂扬人造天地的壮丽画图；共工触不周之山，女娲炼石补天，燧人钻木取火，羿射九日，禹治洪水，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传说，都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人定胜天的志气。这与《圣经》中上帝造亚当、夏娃和舒适的伊甸园相比，完全是另一种境界。在中国大地上，没有产生过主宰一切的上帝。如来佛是舶来品，玉皇大帝并没有统治大千世界的本领，元始天尊也不过是释道混合的偶像。中华民族从本质上说，既没有拜倒于上帝，也没有屈服于大自然，更没有把人与大自然平列，而是以人的姿态改造大自然，欣赏大自然，从大自然中首先看见了人的美，从而看到人手雕刻过的大自然之美。中国的文学艺术，不论是口头的或书面的，都充满着高度现实主义和高度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它所表现的和谐，不是实在生活的简单和谐，而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和谐；它所表现的韵味，不是写生的韵味，而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韵味；它充满着中华民族的坚定、沉毅、肃穆、宁静致远、含蓄刚韧的气质。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突出人的力量，人的价值，人的斗争，人的创造，充满了对于人类自己创造力的赞美！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区别于西洋文化传统的重大特点。

在古代神话和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中，就已经出现了丰富的小说的前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又把它广泛地发展起来。唐宋以来，大量的传奇、话本、笔记、章回小说中，虽然也有一些颂

扬封建统治或者为宗教宣传服务的作品，但更多的则是不同程度地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表现出对剥削阶级和黑暗政治的批判精神，对人民的同情和歌颂。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就是在好的、比较好的作品中也无可避免地渗透有封建意识和小市民的庸俗气味。阶级对抗社会中的两种文艺观点是互相渗透的，直到今天，也是不可避免的。以人民性为主的进步作品中，也会有落后的、消极的糟粕；以反动思想为主导的作品中，也会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这些常常是混杂在同一部作品中。明代中叶以后，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脂砚斋等人的序跋和评点，有许多关于小说艺术的精辟见解，虽然有的还比较零碎而不系统。而且中国的小说理论、戏曲理论，和中国的诗论、画论有一种难以分割的血缘关系。因此，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是一份十分珍贵又十分复杂的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开发、整理这份遗产，对于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提高当前的创作水平和增强民族自豪感，都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小说和小说理论，向来被封建文人视为小道，不予以重视。“五四”以来，虽有不少人作过发掘整理工作，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从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来看，摆在我们面前要走的路程不是很短，而是很长，很长。

从理论体系来说，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也不能用西方形形色色的艺术理论来取代它。国外的文艺理论，不管哪一种体系，都可以借鉴、比较、参考，但不能用来代替我国民族文艺理论。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想，包括小说理论，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从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加以整理、研究和发展，逐步建立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体系。

收入本集的二十六篇论文是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学术讨论会所收到的一百余篇论文中选辑的。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在武昌举行的“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学术讨论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两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专就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进行探讨，这本身就是一件开创性的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这次到会的代表中，有文学史家、小说史家，有文艺理论家、古代文论家，还有美学家。多学科的专家们会萃一堂，不仅能彼此开阔视野，而且将为今后的研究方法开拓一条古今结合，纵横结合，多学科结合的新路来。由于篇幅的限制，由于要能反映出小说理论发展的轮廓，因此有大量的优秀学术论文不能收进这个集子中，这是令人颇为遗憾的！好在有许多论文将陆续被各种学术刊物采用，会有机会与广大读者见面，而不至被湮没。而从选辑到这个集子的二十多篇论文来看，论者都能有自己的某些独到体会，论文都能从某一角度反映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的一个侧面，综合起来，也可初步看到小说理论发展的一些端倪。希望这个集子的出版，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有所裨益。也希望在学术领域的百花园中，古代小说理论研究这朵鲜花开得更加娇艳！

目 录

序.....	李尔重 (1)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的线索	
——兼论金圣叹在文学批评史上之地位.....	张国光 (1)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对小说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陈谦豫 (17)
试论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	傅隆基 (33)
碑论缀遗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述录.....	林辰 (47)
略论明清白话小说艺术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	鲁德才 (62)
中国古代话本小说的人物塑造艺术探踪.....	吴红 (70)
试论评点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张碧波 (79)
说中国小说评点样式.....	白盾 (95)
关于以“奇”为美的小说理论的形成、发展及	
其特点.....	黄清泉 (105)
谈我国古代“幻奇派”小说理论的发展历程.....	阮国华 (119)
明代中后期小说理论的发展及其原因.....	刘良明 (137)
试论冯梦龙的小说理论.....	陆树仑 (151)
容本与袁本《水浒传》评点在文学批评史上的	
地位.....	王先霈 (165)
容与堂本《水浒》李卓吾评非叶昼伪托辨.....	马成生 (181)
金圣叹典型观浅议.....	胥惠民 (197)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艺术评论.....	李茂肃 (205)
金圣叹评《水浒传》的细节描写.....	葛楚英 (218)
论“保护色”	
——谈如何正确理解金圣叹《水浒》评中的思想	

矛盾问题	喻学才	(231)
从金圣叹的“平反”想到对毛宗岗的评价	常林炎	(240)
浅议毛宗岗的小说创作观	蒋松源	(247)
再谈张竹坡的小说评点	王汝梅	(257)
曹雪芹的小说观和李贽的“童心”文学观	白 坚	(275)
论“脂批”的主要贡献	曾扬华	(294)
评《桐花凤阁<红楼梦>评》	王达津	(306)
试就“卧本”评语略论《儒林外史》的民族特色	陈美林	(324)
《聊斋》但评特色之我见	盛瑞裕	(340)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概述	周伟民	(354)
编后记		(359)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的线索

——兼论金圣叹在文学批评史上之地位

张 国 光

我国是一个文学遗产十分丰富的文明古国，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也是源远而流长的。可惜，我国小说理论史的研究，在过去竟是非常薄弱的一环。近几年来，由于在党的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我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领域不断得到开拓，而小说理论的研究也开始为一些文论史家、美学家所关注。首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的召开，显然将进一步纠正对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家的评价的“左”的倾向，为我国古代文论研究开创新局面。

这里，仅把我个人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浅见简陈于后。

一、先秦“小说”的概念与最早的小说集

在我国，“小说”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虽然作者是把“小说”作为“大达”的对立面来加以讥贬的，但也可以看出当时由于社会变革的急剧，各个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紧张，而新兴的“士”阶层需要通过文学艺术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以求获得统治者的欣赏与重视。一个“饰”字就说明了这种小说必须有文彩，才能动人听闻，这或者可以拿唐朝士子的“温卷”与之类比。《汉书》中的《艺文志》一篇，是班固根据前汉大目录学家刘歆的《七略》删节而成，其中就收录了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这标志着“小说”在文化史上有了存在的权利，

至少在目录学中有了附庸的地位。这十五家中前列的“伊尹说”等九家，大约是先秦时人所述，列于它们之后的“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名为“周说”，大约有不少是虞初辑录的先秦旧文。至于“百家”百三十九卷，其中当亦不乏先秦时人之作。

《汉志》小说家后序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然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狂夫之议也。

这里所引孔子之语，是能代表《论语·子张》里的这一保守而又不走向极端的思想的。它对小说虽然不太赞成，却持温和色彩。何晏集解：“小道，谓异端。”又引包咸曰：“致远恐泥，疑难不通。”邢昺疏：“此章勉人学大道、正典也。‘小道’为异端之说，百家语也。虽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观者焉，然致远经久则恐疑难不通，是以君子不学也。”这里要说明，把“小道”解为“异端”，是不正确的。孔子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矣。”对于异端思想，孔子认为并不存在“可观”的问题，看来，视小说为“百家语”，则是不错的。

由于汉末以后又有隋末的动乱，使我国先秦古籍大量散佚，加上小说一流不被重视，《汉志》著录的千三百八十篇，至今大都风流云散，难以重睹，这样，先秦及前汉小说几乎已成为历史上的空白。不过，这些书在《隋书·经籍志》还可以看到某些遗存（《隋志》尚著录有《燕丹子》一卷，宋濂《诸子辨》断为秦汉间人作），更重要的是在魏晋六朝间有一批专以纪人物言行内容的轶事小说与志怪小说同时兴起。如《世说·文学》篇云：“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又《轻诋》篇：“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这可以说是写实小说得到社会的欢迎的例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令人作《通史》后又把未用

的所谓“不经”的资料令殷芸别集为《小说》。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以“小说”作为书名的短篇小说故事集。

前引的《汉志》小说家《后序》由于列入了正史，得到了一般的承认，应该说它标志小说理论前进了一步。著录者虽然不承认小说家为九流之一，但毕竟把它归入“十家”之列，使之取得了“敬陪末座”的资格，并有意把孔子的话拉向“左转”，在“是以君子弗为也”之后，加上“然亦弗灭也”，认为它是有独立于文学史的权利，应该“缀而不忘”，并引用《诗·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作为“理论”依据，使小说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具见作者的苦心。

二、《文心雕龙》与唐宋以后的小说评论

我国的小说理论在《文心雕龙》出现前后可以说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其标志是在南朝齐梁之际的我国的文学批评名著——《文心雕龙》对于当时的小说采取了漠视的态度。由于刘勰千余年来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崇高地位，这样他对于小说的贬斥，就起了束缚小说理论发展的深远影响。我在几年前发表的《〈文心雕龙〉能代表我国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吗？》一文中曾指出此书的不足之处，其一是：

《文心雕龙》“舍己耘人”，对于许多非文学作品作了不厌其烦的评述，它对文体的辨析，也可以说是细密之至，可就是对于当时已经成长起来并且显然是有发展前途的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却不予置评。这就不止是处理问题上的疏忽，也反映了刘勰的保守思想。……千余年来我国小说一直被排斥在正宗文学之外，不登大雅之堂，不能不说不是受了刘勰这类看法的影响。

同时我指出了刘勰否定神话传说，机械地求真，对于小说创作理论的不利影响：

刘勰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却……对于古代神话盲目地加以排

斥。他对于《离骚》、《天问》的“托云龙，说迁怪，丰隆求宓妃，鸩鸟为媒女”，“木夫九首，土伯三目”等，一律斥为“诡异”、“谲怪”，就是一个例证。而在论诸子时，又斥“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以及“移山跨海，倾天折地”，羿射十日，嫦娥奔月等等“不纯粹”与“瞎驳”。可是这些都是千古以来脍炙人口的神话呀！我以为：中国文学史上，正统文学作品的浪漫主义是发育得不健全的，不能说：象刘勰这样著名的批评家的胶柱鼓瑟之见，不负很大的责任。

（见《古代文论研究丛刊》第四辑，一九八一年）

在刘勰之后，唐前期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杂述》一篇分列了十目，其中“小录”、“逸事”、“琐言”、“杂记”可以说是属于故事小说的范畴，其评论基本上还是《汉志》的重申。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需要，终于使我国的文言小说创作在唐代走向了成熟，特别在中唐时期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传奇作品。又由于这些传奇作家本身就是诗人、散文家，他们运用写记传的经验和熟练的语言技巧，把故事情节写得曲折动人，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而且有的作家例如沈既济就在《任氏传》的结尾中写道，他之所以创作《任氏传》，是要“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这就是说小说要能够感染读者，而且需要有优美的文辞来表达。流风所及，连古文运动的大师、自居为“传周公、孔子道统”的韩愈也写了一篇《毛颖传》。大思想家、政论家柳宗元除留下了不朽的山水游记以外，也写了寓言和小说，他认为小说可以供人欣赏，是生活中不能偏废的内容：

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他还认为：韩愈写《毛颖传》“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意于世欤”！这就是说小说应该有积极的主题，评论小说主要不是看它写什么题材，而要看它的社会效果。

唐代传奇在宋朝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虽然由于唐人珠玉在前，相形之下使宋人的传奇大有逊色，但是，正如宋诗不能超过唐诗，但宋人的诗话（诗歌理论）却迈越前人一样，宋代的小说理论也有了发展。北宋赵令畤就通过评元稹《莺莺传》提出了小说传奇应该突出地描写人物形象的问题。他说：

夫崔之才华婉美，词彩艳丽，则于所载缄书诗章尽之矣。如其都偷淫冶之态，则不可得而见。及观其文，飘飘然仿佛出于目前，虽丹青摹写其形状，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

（《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

南宋学者洪迈可以说是一位笔记小说大家，他对于唐人传奇，也有非常中肯的评价：

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

……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端门名家而后可称也。

（《容斋随笔》）

正统儒生只承认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却抹煞唐代小说的地位，而洪迈则认为唐传奇与唐律诗是唐人对文学史的两大贡献，具有同等的意义。这可以说是为小说争历史地位的宝贵见解，可惜的是他只肯定了用文言文写的传奇。洪迈还认识到诗歌创作和传奇创作的相互影响，如果再加上中唐时期古文运动旗帜的高涨这一条，那我们对于唐传奇之所以成为一代之“奇”的原因的理解就全面了。

由于宋代说话艺术的繁荣以及刻板印刷的通行，逐渐有文人把古书加以评点印行。宋末著名的评点家刘辰翁就不仅评点了史书、子书和一些名家的集子，他还评了《世说新语》。这些评语虽说是比较零碎，然而吉光片羽，亦自可贵。故明人杨慎云：“士林服其赏鉴之精博。”（《升庵诗话》）可惜他所评的还是属于正宗文学和文言短篇。

在这里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即我国成熟的小说作品虽然出现

得迟一些，而且系统的小说理论的形成尤在其后，但应该看到我国古代散文是十分发达的，史籍之丰富，尤为旷世所稀见，而在这些浩繁的散文作品中却不乏具有小说特征的作品，在大量评论古文的著述中也含蕴着小说理论史的资料。

我国的散文批评，历来占文学批评史的比重很大。从形式上看来，我国的古文和小说各自独立。但是，事实上它们之间有时是互相渗透，难以分割的。象被称为汪洋恣肆的散文杰作《庄子》，就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寓言小说集。《左传》是我国卓越的史传文，但其中虚构的故事情节颇为不少，所以，韩愈说“左氏浮夸”（《进学解》）。司马迁说《山海经》等书的“怪物”，他不敢言，可事实上他的好多成功的传记文都是用写小说的手法写成的。换句话说，他从历史家的角度为后人积累了写小说创作的经验。这些史传文的创作，和后来的小说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司马迁对我国小说创作的影响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看出：1、善于选择有典型性的人物事件加以叙写。2、重视细节的描绘。3、书中有不少虚构的成份，如为了把项羽写成虽然失败了但仍然是值得向往的英雄，所以在他的本纪之末，加了一段他与乌江亭长的对话。显然这在当时是不可能有的事，即使真有其事，那乌江亭长既不敢坦白交待，试问史家又是从哪里得到这一材料的呢？难怪乎刘勰要批评司马迁是“爱奇反经之尤”呵。此其一。《史记》保存了汉初以前的浩瀚的历史人物资料，这无异于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此其二。我国不仅史籍汗牛充栋，而历史演义也更仆难数。这些历史演义和史籍的关系，可想而知，此其三。我国小说的民族特点是：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历来的文言小说：唐宋传奇也好，直到清初产生的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也好，都是以人物为中心，都是摹仿的史传体。从这些方面说，一个好的史传文作家，有可能创作优秀的小说。而古代关于散文创作方法的论述，也必然有涉及小说理论的内容。——以上是就文言小说的创作理论而言的。

至于白话小说理论，应该说在宋时已具基础。随着宋元时期说话艺术的繁荣，我国小说理论就不仅限于以文言小说为对象，而是逐渐把白话小说作为评论的重点。宋末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而“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而罗烨在《醉翁谈录》中则强调，这些民间说书人都是有丰富的学识的，否则就不能吸引听众：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论历代史书。烟粉奇传，迷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

强调说书人和话本创作者必须博学多识，实际上也就是把白话小说作为新兴的文学样式来加以提倡，罗烨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位白话小说评论家。

三、明代的小说理论

明朝初年，瞿佑撰成《剪灯新话》，虽然这是一部文言小说，但是由于它的内容不免有些越出封建樊篱的地方，因而难免遭到时人的抨击，不是斥它“语怪”，就是斥它“诲淫”。对此，瞿佑在序言中辨之云：

(书)既成，又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诲淫，藏之书笥，不欲传出。客闻而求观者众，不能尽却之，则又自解曰：《诗》、《书》、《易》、《春秋》，皆圣笔之所述作，以为万世大经、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龙战于野”，《书》载“雉雊于鼎”，《国风》取靡靡之诗，《春秋》纪乱贼之事，是又不可执一论也。这使我们想起金圣叹的《水浒》序所谓“《春秋》所书，弑夺什九”以及“十五国风，淫污居半”等惊人的论断来。瞿佑在朱元璋统治时期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手法，借经书来为小说辩解，这可以说是我国进步小说家常用的、也不能不用的一种巧妙

的战术。

我国长篇小说的出现，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滥觞，这部书虽然是用文言文写的，但“文不甚深”。此书到嘉靖元年才有刻板，现在我们所读到的题弘治间庸愚子所作的序文就提出了一个历史演义的创作的理论问题，他认为：

然史之文，理微义奥，不如此，乌可以昭后世？《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

就是说历史小说应该通俗易懂，但又不应任意虚构，过于背离史实，如果“失之于野”，那知识分子就会“厌之”，因而不可能被列入文学作品之林。

随着《三国志通俗演义》出版不久，我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忠义水浒传》（百回本）也在嘉靖年间刊行，同时也就出现了最早的《水浒》评论。李开先的《词谑》说：

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

这说明《水浒》一出现，就受到文坛的重视，当时的“嘉靖八才子”把《水浒》和《史记》并列，不怕抹煞《史记》以下的其它文学名著。所谓“委曲详尽”，也就是说一部长篇小说需要有曲折的故事，丰富的题材。所谓“血脉连贯”，就是说，要使全书成为有机体，首尾连贯、情节先后吻合、主题一致。他们对于白话小说能有较高评价，不愧称为“才子”。

今所见到的天都外臣《水浒传》序则称这部小说所写各种人物，“无所不有”，“其情则上下同异，欣戚合离”。又称全书“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不丝不紉”。这是对嘉靖八才子的评论的发展。

开小说评点先河的明代思想家李贽也于万历中为《忠义水浒传》写了序言，并作了评点。稍晚于李贽的叶昼也假用李的大名，评点了这部小说，这就是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刊行的《忠义水浒传》百回本。接着苏州书商袁无涯又刊行了题为杨定见作序的《忠义水浒全书》，其中也有标名李卓吾的评语，由于这些评语和容本有相同者，有不同者，还有观点互相矛盾者，这就说明两书的评语非出一人之手。大体说来，全传本的评语有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观点相合者，可以作为它原出李贽之手的信据，至其与容本相同语句，则可能是刊行者从容本抄袭而来的。两相比较，袁本的评语，愚忠思想极为浓厚，其艺术见解比起容本来还要逊一筹，而且比较简单、零碎，文笔也颇拙劣。

四、金圣叹何以能攀登我国 古代小说理论的高峯？

由于金圣叹的《水浒》评的出现，我国古典小说评点的形式才发展到完备的地步。而且在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和思想性以及关于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等问题的探讨方面，也只是到金圣叹才比较全面和深入。那么，金圣叹之所以能够攀登我国小说理论史的高峰的原因何在呢？窃以为：

首先，这是时代孕育的结果。明朝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金圣叹的家乡苏州，又是我国东南最大的商业城市和我国文化出版中心。由于这个地区市民阶层的力量不断膨胀，力图突破封建樊篱，从而出现了启蒙的思潮。当时印刷条件又比较过去大为便利，从而促使小说创作如雨后春笋，这也就推动了某些文学家打破正宗的诗、文、词评的框框，把注意力转向小说评论。显然，如果没有这样的时代条件，金圣叹是不可能集中主要精力在三十岁左右，“心绝气尽，面犹死人”地来完成《水浒传》的评改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的。